

# 鱼群的洄游与南海早期先民

肖一亭

(珠海市博物馆 广东珠海 519015)

The seasonal swimming to the upper river of shoals, undoubtedly, have great impact on fishermen. However, this impact did not directly lead to the seasonal habitation during Pre-Qin period.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the affluent food in the north of South China Sea all year round, people saw no necessity to move arou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ductivity at that time did not permit seasonal emigrant for just a few fishes.

Key Words Shoals Swim Against the Current Seasonal Settled Living

**内容提要** 鱼群季节性洄游对渔民的生活无疑是有很大的影响,但在先秦时期这种影响并没有直接导致先民的季节性居住。一方面是南海北岸及海岛海湾附近一年四季都不乏食物资源,无需作季节性迁移;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为追随几种经济鱼类而长期在船上随季节移居的要求。

**关键词** 鱼群洄游 季节性 定居生活

**中图分类号** Q959.4

**文献标识码** A

21 世纪初,考古人员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的发掘,发现大量的住房基址、墓葬群、石器制作场、作坊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甚至礼器;在香港沙下等遗址又发现大量的稻属植物硅酸体、栽种的葫芦科硅酸体及稻米<sup>[1]</sup>,这些实物资料足以说明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农业生产,沙丘遗址上曾有人定居,环珠江口地区曾经有过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本文对沙丘先民在鱼群洄游时是定居、还是季节性移居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大部分鱼类都有洄游的习性,洄游是鱼类对于环境的一种要求,通过迁移寻找到适应鱼种生存、繁殖的环境。鱼的洄游可分为生殖洄游、索饵洄游和越冬洄游。生殖洄游也叫产卵洄游,即从越冬场向产卵场迁移;索饵洄游也叫育肥洄游,是从产卵场或越冬场向索饵场迁移;越冬洄游也叫适温洄游,即从育肥场向越冬场迁移。这种洄游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鱼儿聚在一起从某一处出发,沿着一定的路线周期性的群游。

鱼类这些生活习性,很早就有人观察到,并试图探索其与古人类文化的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地质学家苏泽霖在《地貌与考古学》中指出:“沙丘遗址应属于渔捞的生产方式为主,香港海湾沙堤遗址多集中在西南部的岛屿,如大屿山、长洲、索罟群岛等,因此又与渔场分布有密切关系,因为捕鱼有季节性,鱼群又和海洋的流向有关,可以通过渔场捕捞的季节来推定海岸遗址所停避的时间。”<sup>[2]</sup>

近年还有学者提出,各渔场汛期皆异,假如史前遗址与渔业有关,那么,其四周聚落居住停留的季节便有了不同。鱼类洄游受水温、盐度等因素左右,所以网捞某几种鱼类必然出现季节性迁移。于是出现逐鱼群而居的生活,因此各岛屿和大陆沿岸的部分聚落可能是季节性的。这些分析推演出的情形是:一群以打鱼为生的人,由于鱼的季节性洄游,打鱼人也跟着作季节性迁移。笔者认为,这种季节性迁移现象是有前提的。从时间上看,在先秦时期的适应性有限;从范围和程度上看,不能由

此推导出南海的沙丘类型遗址是季节性居址。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南海北岸及海岛海湾附近,一年四季都不乏食物资源<sup>[3]</sup>,不需要为找寻食物随季节迁移;另一方面是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当时生产工具简陋、渔业知识缺乏,为追随某几种经济鱼类,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使渔民长期在船上随季节性迁移的要求。

#### 一 鱼群季节性洄游不影响渔民长年打鱼

鱼群洄游,其不同的鱼种有自己洄游的周期、路线和场地,南海北岸特别是环珠江口地区,长年不乏鱼类资源。中国近海大陆架宽广,有长江、黄河、珠江、辽河等大小5000多条河流汇入。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中国近海能有富饶的渔场。中国近海渔场面积150万平方公里。主要渔场有:黄渤海渔场、吕泗渔场、大沙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东沙渔场、北部湾渔场、中沙渔场、西沙渔场、南沙渔场等。其中的黄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北部湾渔场由于产量高,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渔场”。近海渔场有鱼类1800多种。主要经济鱼类有70多种,包括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鲐鱼、鲳鱼、鳙鱼、纳鱼、马鲛鱼、青鱼、鳊鱼、马面鲀、蝶鱼、石斑鱼、金枪鱼及墨鱼,对虾、毛虾、梭子蟹、海蜇等。其中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是中国人民喜欢食用而且产量较大的海洋水产品,被称为“中国四大海产”。

珠江口地区属于上述南海沿岸渔场,这里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根据水产部门的资料,中国内陆水域共有鱼类795种(包括亚种),珠江水系有鱼类381种(最新的统计有450多种),长江水系有370种,黄河水系仅有191种,东北黑龙江水系有175种,西部地区鱼类稀少,如新疆仅有50余种,西藏仅有44种。因而,珠江是我国陆地水域最富“生命”多样性的江大河。此外,与珠江水系形成鱼类洄游关系的南海海域,生物种类资源也极为丰富。据《全国渔业资源调查和区划》统计,我国海洋鱼类有1694种。其中,南海北部大陆架海域的鱼类有1064种,东海大陆架海域的鱼类有727种,黄、渤海区的鱼类约有291种。不过,正如《珠海市志》所说,这一地区的“渔民千百年来习惯于在沿海各岛屿浅海山边作业,没有固定渔场。”<sup>[4]</sup>直到1957年8月,根据广东省委批转农村工作部《关于对待流动渔民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对渔场所作的原则规定精神,珠海县首次制定渔场管理规则。从珠海的渔场看来,东起大鹏湾,西至荷包岛水深100米的水域,共有6个渔场,13个海区。

总面积为1.52万平方公里,占水域面积2.7122万平方公里的56%。这里我们摘录有关珠海渔场的资料如下。

1. 内海渔场(即珠江口渔场):从番禺县的龙穴岛南起至万山岛以西至荷包岛。渔场海区水深30米,主要产鱼类有曹白、马鲛、鲳鱼、红三,每年3、4月是渔汛旺发季节,渔民俗称“三月水”,最高捕捞量为2万担。

2. 浅海渔场:从蚊洲底到荷包横,水深30~40米的343、344海区是主要渔场位置。每年2、3月赤鱼群集,最高产量为10万担,这里每年8~10月又是钙鱼的旺发季节,最高产量约有10万担。

3. 池鱼渔场:从万山至荷包横,水深40~50米的344、371海区是主要的渔场位置,每年1~4月是渔汛旺季,本省渔船和福建、广西部分渔船近600艘,集中到这里生产。一般渔汛期捕捞量为20~40万担,最高年产60万担,1980年以后渔汛逐渐消失。

4. 中海渔场:万山横40~80米水深的370、372、398、400四个海区是拖网作业的主要渔场,主产鱼类最大宗的是池鱼、南鲳、带鱼、目鱼、大眼鸡、红三、红线等,60~80米水深的398、399两个海区还盛产羊鱼。渔场渔汛分两期:春汛3、4、5月,秋汛7、8、9月。

5. 外海渔场:上60至二门外海90~130米水深425、427、429海区是主要的渔场位置,这个渔场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发,主要生产池鱼、丁鱼、红三、鲢鱼、石斑等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每年7~10月是渔汛旺发期。

6. 虾场:蚊洲底至荷包横30~40米水深的343、344海区是主要作业区,5~9月为渔汛期,每年在此海区作业捕捞量最高在10万担,同时343、344海区每年4~6月又是盛产鱿鱼的作业区。

以上6个渔场,13个海区,最高年度捕捞量约360万担。此外,南水、横琴岛环岛四周浅海、淇澳岛浅海还盛产螃蟹;万山群岛、担杆列岛、高栏列岛盛产紫菜、江篱、海藻等藻类;九洲、桂山等岛屿有贝类;各岛屿有石斑、立追、龙虾等经济价值高的鱼虾类。

渔场的划分与捕鱼工具的发展有较大的关系,根据《珠海市志》记载,1954年以前,流动渔民出海只靠手摇橹、风帆船。1955年有少部分渔民开始使用机动渔船来取代人力船和风力船。

1957年,机动渔船已占渔船总数的20%,60年代,风帆船被淘汰。

渔场划分之后的几年,渔网也进行了改进,以前用麻网,起网全靠人力。20世纪60年代后,改用尼龙网,使用绞缆波起网。以前靠经验目测鱼群,60年代后期,使用鱼探机。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对讲机。海上与陆上可以互通鱼情,少数渔船还有雷达设备。20世纪80年代使用无线电话、定位仪、导航仪等设备。

根据《中山市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共有渔户2620户,使用的渔具有大缙、小缙、缙门、竹箔、簍箔、滩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风箔、方网、辘网、布箩、竹箩、鱼篮、蟹篮、大罟、竹箕等19种。

民国年间,中山捕捞作业使用的主要渔具有拖网、刺网、流网、张网、虾罟、拉罟网、插罟网、百袋罟、抛网、缙棚、缙、门缙、扒艇、大小钓具以及沉虾笼等。民国22年(1933年)有各种无动力渔船2004艘,主要在珠江口一带近海及内河捕捞鱼虾。30年代后期日军侵占珠江口一带后,肆行焚毁渔船,杀戮渔民。中山县的渔船相继逃至香港、澳门一带躲避。民国27~28年间,被日军焚毁渔船39艘,被害渔民达数十人。民国28年全县渔船减至600艘。

对于几千年前的海岛居民来说,沿岸的鱼已经足够其食用,没有必要到较远的地方去捕鱼。根据《珠海市志》记载:“珠海20米等深线以内的海区,多港湾及岛屿,是各种鱼类、虾类产卵繁殖生长区,总面积1231平方公里。该区海底平坦,以软泥为主,亦有部分泥沙底质,沿岸受内陆河流入海的影响,有大量的有机物,饵料丰富,盐度较低,盐度变化与径流量多寡相关。主要鱼类有马鲛、鲷鱼(曹白)、鲈鱼(三黎)、棘头梅童鱼(黄皮)、七丝鲚(马鲚)、中国鲳(白鲳)、斑鰽(黄鱼)、鲷类、红眼鲈(盲曹)、石斑、狼段虎鱼(鱼乃鱼)、中华青鳞(青鳞)等。甲壳类有墨吉对虾、近绿新对虾、周氏新对虾、清蟹等。该区年产量35万担。”

近年来,由于捕鱼工具的改进和捕鱼技术的提高,捕捞强度也大大地超过了鱼资源的再生能力,尤其是优质鱼种逐年减少,区域海洋的生态资源难免不遭破坏。在古代,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捕鱼还不足以对自然生态造成较大的破坏,加之没有农药,没有工业污水排放的污染,沿岸环境给了鱼类良好的生存空间,特别是海湾地区,更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可以想象当时的鱼类资源是

多么的丰富。

## 二 海岛上至今还生活着一批以打鱼为生的渔民

目前,在珠江口外的海岛上,还生活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渔民<sup>[5]</sup>。从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到古老先民的生活影子。1998~2000年,笔者向高栏岛渔民作了调查。高栏列岛位于珠海市香洲区西南部,主岛高栏岛,距香洲48公里,是扼崖门、虎跳门、鸡啼门的入海口,东面隔海与万山列岛相望,北邻南水岛,西临台山,南为南海。总面积为52.8平方公里。高栏列岛由高栏、荷包、大襟、大芒、三角山等5个大岛和29个小岛组成,是珠江以西的重要列岛,因高栏岛占列岛面积最大,有35平方公里,故得名。该岛水源充沛、土地肥沃、食品丰富,是人类良好的栖息地。

高栏村的成年男子除少数进城打工外,多数都是渔民。陈国民渔民告诉笔者,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高栏岛周围以打鱼为生,以前的渔船都是手摇橹,近年来几乎家家都有一艘机动小渔船,因高栏岛各个海湾都先后被开发,或为码头,或为游泳场,渔民不得已到不远的荷包岛附近海域打鱼。渔民一年四季都要出海打鱼,只有“情况特殊”才不得不稍事休息。笔者问何为“特殊情况”,告知为遇到天太冷、或风太大时。一年中他们累计休息的时间也不过1~2个月。也就是说,渔民们不是整个季节都休息,而是遇上恶劣天气作短暂的休息。

像高栏岛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渔民在南海北岸及岛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可推知史前的先民难以普遍或有意识地按上述黄花鱼洄游路线进行居地迁移。

## 三 采集和农业是南海北岸及岛上居民生活的重要补充

高栏岛距南水镇陆地最近的地方都有9公里,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调查资料,当时高栏岛上居住着2809人,有耕地2480亩,分5个自然村<sup>[6]</sup>。

20世纪80年代以前,高栏岛上人均耕地将近一人一亩,当时高栏岛上没有与大陆连接的淡水供水管道,不单2000多人的生活用水要在岛上自给,还有2000多亩的耕地用水也都是由高栏岛自身的淡水来解决,其中相当多的耕地是水稻田。可见长期以来高栏岛上的淡水资源相当丰富。

高栏岛居民有着与中原地区“男耕女织”不同的生活方式,岛上的农田主要由妇女耕种,男人大多在外面打鱼,过着典型的“男渔女耕”的岛民生

活。当时这里还是一个相当边远的地方,从珠海香洲去高栏岛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岛上村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为了保证人口的繁衍,岛民还保留着古老的习俗,村里的女孩子在成年以后就离开父母,搬到外面的公共场所去住,与其他同龄女子住在一起,直到她们找到如意郎君,才到男方的婆家生活。

在香港东湾遗址、珠海宝镜湾等遗址中,都出土大量石磨盘和石磨球、石杵。宝镜湾遗址中还出土长30厘米的石攫,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可能性。特别是2001~2002年间香港沙下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中,采用浮选、孢粉和植物硅酸体分析土壤和文化堆积中保存的植物遗存。在这里发现并鉴定出完整的稻属植物硅酸体、栽种的葫芦科硅酸体、甚至人工栽培稻米<sup>[7]</sup>。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广东高明古耶贝丘遗址中也发现20粒保存完好的稻谷,遗址中还出土贝壳、陶釜、陶罐、石斧、木块和动物骨骼、植物橄榄、南酸枣等,该遗址年代距今4000多年,当时这里也是大海的边缘。这些出土实物资料充分显示出南海先民在先秦时期就有栽培植物的活动。海边和岛上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十分丰富,为先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 四 流动渔民的存在是依靠稳定的居民

在我国两广、闽、浙滨海沿江水域,很早以前就活动着一批百越的后裔,从宋代以来被称之为水上疍户,他们与西南太平洋及南海周围诸岛的民族一直保持联系,驾舟泛宅航行海洋。最早见著于《淮南子·说林训》中记载“使但吹竽,使氏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这里说的“但”就是“疍户”。时至今日珠江口地区仍有不少以船为家的“船民”。但是,这些船民的存在,不能说明沙丘遗址的先民属于季节性的居民。理由如下:

1. 从年代上看,珠江口地区沙丘遗址的年代一般在距今6500~3000年前<sup>[8]</sup>,而文献记载的“疍户”出现较早的年代在汉代,大量出现在宋代。

2. 从船的大小和技术看,先秦时期一般渔民的渔船还不具备以船为家的条件<sup>[9]</sup>。

3. 流动渔民的生活移动性较大,但是他们离不开岛上固定居民的补给,包括食品、淡水、生活必须品的补给。

4. 流动渔民的存在,与商品经济有关系。渔民打鱼为生,并不代表渔民一年到头都是吃鱼。渔民往往将捕捞的鱼卖给陆上居民,换取其它食品、生活用品。

5. 流动渔民一般都有相对固定的停靠港,修理、加固船只,躲避台风。

6. 流动渔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的。我们难以想象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能在不同的部落之中随意进行商品交换。

7. 沙丘先民捕鱼、捞虾大都是在住所附近的海湾、山边。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造船技术进步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各种鱼群洄游规律的认识,也从感性的、零碎的发展到理性的和全面的。南海早期先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难以像后代渔民较长时间居于船上,更难做到为追捕某些经济鱼类大范围、长距离的奔波。大量的早期居民只能就近在岛上、岸边捕捞鱼类、拾取贝类,并以农业、采集和狩猎作为重要补充。宋代大量出现的以船为家的“疍民”、“船民”,在先秦时期的南海地区尚属少见。因而,鱼类的季节性洄游,在当时并没有相应地产生大量的季节性居住的渔民。只要食物资源能够维持生计,居住于南海的大量沙丘、贝丘上的早期居民,应该大多还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定居生活的<sup>[10]</sup>。

[1]严文明:《香港的远古文化——西贡沙下考古发现·序言》。

[2]So, C. L., 1969. Landforms and Archaeology, JHKASVI.

[3]不同的鱼类,其季节性洄游的时间、路线也不尽相同。

[4]《珠海市志·第三十五编·流动渔民》,珠海出版社2001年,第1013页。

[5]《珠海市志·第三十五篇·第二章》。

[6]《珠海地名志·高栏岛》:“全岛共有2809人,耕地2480亩,以渔农为主”,第122页。

[7]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编制:《香港的远古文化——西贡沙下考古发现》2005年10月。

[8]深圳咸头岭沙丘遗址有关测定数据显示:在环珠江口地区,沙丘遗址的最早年代可以向上推到距今近7000年前后。

[9]珠海宝镜湾遗址之中,发现一件重量为18.5公斤的先秦时期的石锚,为目前所见环珠江口地区最大的一件先秦石锚。这种石锚所能匹配的船的大小重量尚无研究,但可以肯定这个船的大小,也不足以使一家人在上面较长时间生活。

[10]这里讲的“定居生活”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对应于曾经流行一时的“季节性生活”而言的。原先有学者认为,南海的沙丘遗址是先民在一年中的某个季节才在此生活的遗址。